

快报北京调查 被压缩的“低端劳力”

顺义强制关停小企业、小门店,不想离开北京的外地人,感觉正被什么东西赶着走



外来工们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很可能随着父母“被压缩”



开废品回收站的老陈不想回老家,但他说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

“俺们是在家乡生存不下去,才来北京的,现在看来,北京也很快要呆不下去了,”老陈的妻子在一片由废水泥袋扬起的灰尘中说。她头也不抬,只是默默地干活。

北京顺义区顺西大街附近,有一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老陈是几个租用该处房屋搞废品回收的小老板之一,一家子从河南信阳来到这里已经十多年了。

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老陈手里的这些废水泥袋,是他们半年间回收的,“要是这样下去,那真没法干了,”老陈的妻子说。

北京顺义区顺西大街附近,有一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老陈是几个租用该处房屋搞废品回收的小老板之一,一家子从河南信阳来到这里已经十多年了。

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老陈手里的这些废水泥袋,是他们半年间回收的,“要是这样下去,那真没法干了,”老陈的妻子说。

公司场院内有十多间平房,每一个门脸代表着一个老板。但是8月5日中午,偌大的空地内,只有老陈一家在忙。

这一切并非偶然。从2008年初开始,顺义区集中整治废品回收点,到2009年下半年,整个区的废品回收点减少了六成。

感受到这股压力的不只是废品回收行业。

8月3日的《新京报》报道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形成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北京“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调研组还重点介绍了北京顺义区控制流动人口的经验——通过清理小门店、小企业,顺义区的流动人口仅有北京其他几个类似远郊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老陈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开的废品回收站,很可能马上要成为被清理的小门店,而他们自己,也很可能成为数据中减少的“低端劳力”。

在当地,越来越多的“低端劳力”开始考虑明天怎么过,北京,这个梦想中的城市,还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吗?

»聚焦

我觉得不光是市场在逼我走

“金融危机了呗!”老陈这样解嘲回收站的“清仓甩卖”。

他们想把储存已久的废水泥袋拉走卖掉,手上能有笔活钱。老陈话不多,可能与大中午装卸废水泥袋太累有关,但熟悉他的妻子不这样想。过去,都是别人一车车往这拉废品,现在是到处也收不来多少。如果生意好做,再多的活都累不倒老陈,“来北京不就是为了多挣钱吗?”

成天在工地卖面条的一位妇女说,很多工程都接近完工了,像废水泥袋之类的物件肯定越来越难收。开黑出租车的老赵是顺义本地人,在他看来,顺义的农村越来越少,所以废品站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现在,生意少了,但是租金、水电等各项费用还得交,这不是一笔

小数目。

老陈10多岁的儿子在院院里玩耍,他是从老家河南赶来过暑假的。老陈夫妻两人在灰尘里忙碌着,全然顾不了儿子在干些什么。老陈的儿子想要把自行车骑出去玩,飞跑过来跟老陈商量。

到开学的时候,小男孩又将回到老家,一家三口继续着分居生活。“没办法,”老陈说,在顺义这里上学难度不小,只能这样了。

拾荒者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说来自黑龙江的拾荒者老王。“这么艰难,回不回故乡?”“也许吧。”

在河南村租房的小杨干的则是装修活,这一段是淡季,比以往更长的淡季。

黄昏的时候,小杨在村里闲

转,手上捻着一根在路边摘的狗尾草。他的脚下是新修的一条封闭式排污沟,旁边扔了不少建筑垃圾。小杨最近接不到活,这是他苦恼的地方。

“我总觉得不只是市场在逼我走,后来那里拆迁了,他和老婆来到了河南村。他是河南南阳人,在这里住有一种亲切感。”

如果河南村也拆迁呢?他说,那就继续搬。“如果这里呆不下去,那就走人,老家现在也不差。我在考虑要不要现在就回去。我总觉得有东西推着我们动起来去。”

他算了一笔账,结果是在家乡干装修和在顺义干装修挣得差不多,然而,在南阳,消费水平、生活成本要比顺义低得多。

这种现实的考量,在每个地方

都会发生。在顺义本地的司机老赵看来,小杨和更多的人一个地儿一个地儿地搬,是必然的结果,“最后他们只会搬出顺义,搬出北京地界。”

“我总觉得不只是市场在逼我走,后来那里拆迁了,他和老婆来到了河南村。他是河南南阳人,在这里住有一种亲切感。”

如果河南村也拆迁呢?他说,那就继续搬。“如果这里呆不下去,那就走人,老家现在也不差。我在考虑要不要现在就回去。我总觉得有东西推着我们动起来去。”

他算了一笔账,结果是在家乡干装修和在顺义干装修挣得差不多,然而,在南阳,消费水平、生活成本要比顺义低得多。

这种现实的考量,在每个地方

一个时后,李诚妈妈的凉面还剩了一小半,这意味着,下午她还要来一次。面是她花钱进来的,得尽量卖掉,不能糟蹋。

相比李诚妈妈,卤面却好卖得很,最后剩的底子,几乎要被河南民工抢起来。

卖卤面的河南妇女姓裴,她的丈夫小陈后来也骑了三轮来会合,小陈的三轮车里还剩了不少卤面,但夫妻俩已经没心思再做生意了,他们两岁的孩子病了,要赶紧回出租房带孩子去看病。

看到卤面一家的离去,李诚妈妈说起了自己的孩子。“从来没带他去玩过,我卖面条也只能拖着,日晒雨淋的。”

再回到家,李诚妈妈收拾房间,她男人坐在床上若有所思。快下午两点了,炊烟仍未有升起的意思。屋里盘旋着苍蝇,像是在搅乱男主人的视线。

李诚姥爷看外孙的目光非常热乎,他这次是来接李诚回去上学的。

“上学要走山路,好远的。”李诚姥爷说。

李诚妈妈原来倒是有让李诚在顺义上学的打算,也去问了学校。按照她的说法,要想进当地学校,还得给人送礼,她的一位熟人就是这么干的。

不少顺义当地人都说,现在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孩子上学,都是一样待遇。事实如何,并没有考证。

小男孩全然不知做妈妈的不舍,和姥爷非常亲昵地玩耍着,并且从一张床蹦到另一张床上。而这些床紧挨着墙,墙上已经被他画得一塌糊涂。

8月6日,顺义区召开“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规划讨论会,“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一项明确要求。这样的要求,很多外地人并不知道,但他们感受到了照顾下一代的困难。

“如果有一天呆不下去了,就回去吧。但我们现在不想回去,”李诚爸爸说。谁也不知道,这“有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调控

“压缩低端劳力”引争议

关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压缩低端劳力”的建议,这些在顺义生活了多年的外地人并不知道,他们很少会留意这样的消息。但清理小门店、小企业却让一些人有话要说,“我不知道那些政策,但好几个老乡已经回老家了,说是搞不下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在顺义,那些因为种种压力而走到“被清理”边缘的流动人口,确实在进行着一种看不见的迁徙。

关于顺义调控流动人口,较早见于报章的消息,是《新京报》在2006年11月17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中有这样的概括性陈述——区长李平:关停低水平的小市场,疏通闲散人员离开顺义,但不强制限制外来人口进入顺义的门槛;顺义拟指导流动人口迁移外地。当年前后,顺义和通州、亦庄作为三个重点新城,拉开建设序幕。

在这段时间内,在整个顺义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对于流动人口的“限制”,至少从新闻报道上看不出这样的痕迹。

8月6日下午,记者致电顺义区总工会办公室,表示要询问和顺义模式有关的问题,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表示,询问有关情况要找王主任,并且给了电话,拨通后,王主任不在,工作人员找来了



在顺义打工的外地人,已经感受到了可能“被压缩”的忐忑

»延伸

外地人、本地人大家都不容易

“我希望他们离开这里,”这话出自顺义本地的90后女孩阎萍之口,“他们”是指河南村的外地人。这句冷冰冰的话,又紧密联系着户口问题。

“我来北京10多年了,户口有啥用?买房子又不看户口?”一家饺子店的山东籍老板说。他的店位于新顺南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吃街,街上不乏小门店。

但也有顾客背后说他是矫情,“瞧不起什么也不能瞧不起北京户口啊,有本事,你搞一个看看”。

作为一名高中女生,由于暑假在车队打工的需要,阎萍就近租住在河南村。她认为外地人远远超过本地人的河南村不安全。

河南村76岁的赵奶奶也说,“他们应该搬走,不然不好管。”她倒是也没听说过“赶外地人走”的信息,“如果要赶,不是早就走了吗?”

河南村的顺义人,对外地人颇有微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安宁被打破,而治安也开始出现问题。阎萍说起一件事,有一天她在家洗衣服,就有一外地妇女探头探脑,最后闯进来了,被质问的时候就回说是找房子的。关于偷窃案,阎萍和赵奶奶都能说上一两起。

然而,租住在这里的外地人,却有不为本乡人所知的快乐,他们大多没有离开的意思。一名在村道上

玩耍的男童,他的爷爷刚从东北赶来带他,“孩子在这里比老家好”,爷爷说。男童的妈妈是山东人,以前打工,前段为了照顾孩子,就没干了。

“本地人被外地人欺负还差不多,”一名在村里扫地的中年妇女这样说。不过,这个问题在拾荒者、黑龙江的老王看来,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他认为当地人很不好好,一次,他在淮门前捡瓶子,那人就跟他要分钱,“我才挣几分啊,他就这样?”

并不是顺义本地人都“排外”。开黑出租车的老赵就认为,外地人是赶不走也不该赶的,即使是没什么文化的人,也不该受到排挤,“大家都容易,何苦呢”。

老赵说,他在这行就有很多外地朋友,“蹬人力三轮的好多是外地人,他们和本地同行也处得不错。”

“低端”我已经够低的了,还有谁比我们这一行还要低啊?”48岁的力车夫老胡略带夸张语气地说,他是顺义本地农村人,干这行十几年了。

瘦小、皮肤黝黑的老胡有足够的底气,他养活了全家。他的一双儿女,上高中和大学的学费都是靠他一双腿脚蹬出来的。

老胡说,他虽然是本地人,却很反感“压缩低端劳力”的做法,“只要他能靠这个挣钱养活自己养活全家,凭什么排挤别人?”

»对话

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压缩低端劳力”很可笑

昨日,身在香港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接受了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认为,“缩减低端劳动力”非常可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居然有这样的提法,让他很吃惊。

柒周刊:通过调控人口规模,甚至运用强制手段,来缩减所谓的低端劳动力,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怎么看?

冯兴元:这样做是不对的,每个地方都需要一般性的就业。

柒周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建议,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应如何理解产业结构的调整?

冯兴元:单纯强调某种高附加值的就业,比如说要提升产业结构啊,等等,本身是有问题的。

柒周刊:有评论认为,“缩减低端劳动力”显现了户籍改革之难。

冯兴元:搞户籍改革也可以吸引外来人才啊,中国吸引外来人才的空间是很大的。很多部门都可以引进人才,但这并不影响创造当地面向普通百姓的就业。

柒周刊:建议称,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和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这样做合理吗?

冯兴元:想通过提高就业的障碍,来减少低端的就业人数,包括设置门槛,不让低端劳力做生意和工作,这是很可笑的。

»记者手记

他们可以自由行走吗?

闷热的北京,被8月4日的一场大雨给解救了。雨后的顺义,有一种秋凉的感觉。

作为北京东北的重镇,顺义拥有北京模式的宽大马路,却不具备北京主城区般的人流,而这样的人流,是不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

来自陕西阳平关的老唐在工地上砌砖,老唐的儿子也在北京做服装加工,但收入微薄。他来北京也是为了给儿子凑结婚钱。他的梦想是,儿子有了钱就有希望娶个北京女孩,然后再弄一个北京户口。

问题是,随处可见的外地人可以自由地行走于街道,却不能自由地行走在政策里。首要的一条是,户口。这东西太让人纠结。

在“顺915”线公交车上,一名操着普通话的中年男子向我指路。在顺义生活了21年的他,熟悉这里的任何区域的历史沿革。但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名只有顺义暂住证的湖北籍人。

我入住的一家宾馆有人告诉我,这有不少外地姑娘嫁给本地人从而获得了北京户口。但来自东北的清洁工小孙却告诉我,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她自己就是和同乡结了婚,至今还是东北户口。

北京的媒体朋友告诉我,一位知名网站的副总,马上要转为北京户口,这是高端人才引进计划的结果。

“您说的是精英计划吧?”在外表颇有些陈旧、人流量也有限的顺义火车站外,马上去南昌读大学的顺义女孩小张仰着脸反问我。

“合理调控人口规模”,被不少评论人直截了当地指为“压缩低端劳力”。作为一项政策或规划,它与精英计划互为两极,或可称之为“低端计划”。

确实是,够低端的。